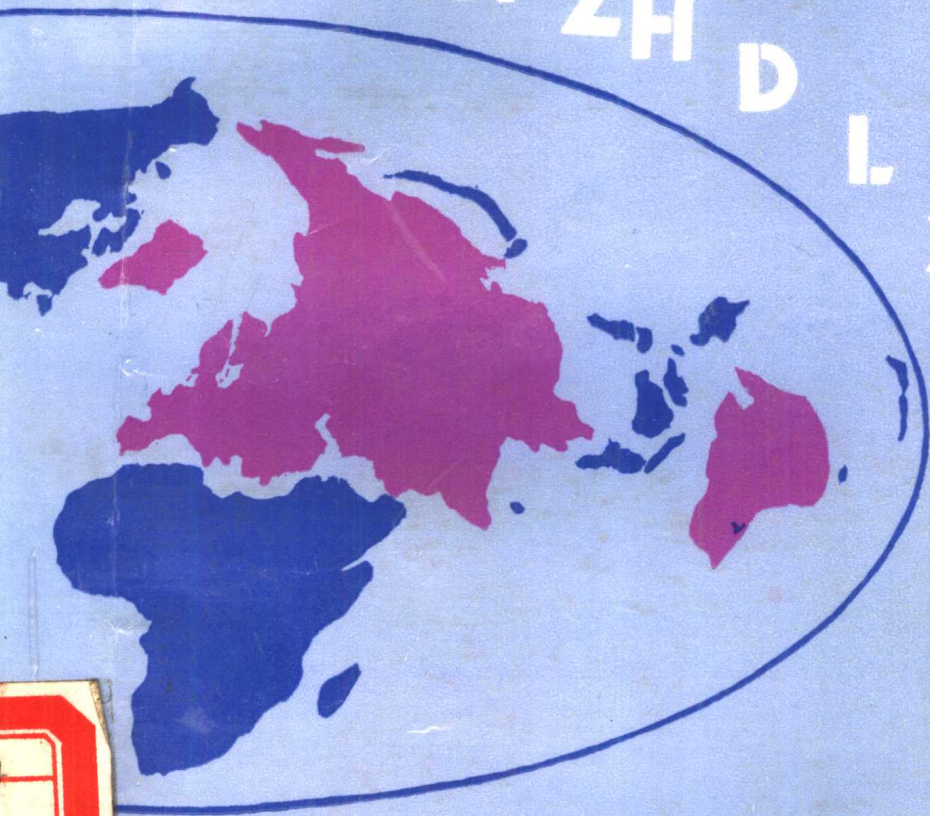


现代政治地理学

王正毅 著

X D ZH ZH D L X



南开大学出版社

现代政治地理学

王正毅 著

南开大学出版社

〔津〕新登字011号

现代政治地理学

王正毅 著

南开大学出版社出版

(天津八里台南开大学校内)

邮政编码300071 电话349318

新华书店天津发行所发行

河北省昌黎县印刷厂印刷

1993年4月第1版 1993年4月第1次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0.25

字数: 25.4千

印数: 1—1000

ISBN 7-310-00550-3/D·38 定价: 6.10元

关于政治地理学的几个理论问题

(代序)

鲍 觉 民

一、政治地理学的性质和研究对象

人文地理学有着广阔的研究领域，它从空间的角度研究整个人类活动，包括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各种活动和现象的分布、变化，以及它们与地理环境的关系。因之，人文地理学也就相应地含有经济地理学、政治地理学、社会文化地理学、聚落与城市地理学、历史地理学等几个大的分支。其中的政治地理学，研究人类社会的政治活动和政治现象与地理环境之间的关系，这既包含对人类社会政治现象进行空间分析，又要求研究政治决策对于地理环境造成的影响和作用。当然，影响人类社会政治活动和政治现象分布、变化的因素很多，有经济的、民族的、宗教的等许多方面，且在一般情况下，许多因素经常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虽然如此，但古今中外的历史事实证明：地理环境在不同程度上都直接或间接地成为影响人类社会政治活动和政治现象的一个重要因素；人类政治生活和地理环境之间，有着相互作用的关系。

因此，政治地理学的研究内容可以概括为两大方面：一是地理环境对于人类社会政治行为和决策的影响；二是人类政治行为和决策对于地理格局的反作用。这两个方面，在不同的地区和不同的时代，可以表现为很不相同的特点。显然，尽管地球表面各个地区的海陆、气候、地形、生物、矿藏等自然条件千差万别，

随着时代的更替也发生一定的变化，但它们相对地与同历史一起变化的人类智慧、能力、经验、组织相比，就要小得多，故而，在人类社会的历史长河中，政治地理格局的确定和变动，人总是居于主导的、活跃的地位。

当今世界，国际政治形势错综复杂，国家之间的关系纵横捭阖，明弛暗紧，牵一发可动全身；同时，各国竞相发展国内经济，增加国力，不同制度的国家实行迥然不同的战略和国策，政治内容无不带有明显的个性与特点。现代政治地理学，除了研究一些具有共同性或一般性的内容之外，由于不同国家存在着这样那样性质各异的具体政策和战略纲领，更需要分别主次，进行比较分析，因为人类社会的政治活动和政治决策，总是代表着一定的阶级或政治集团的利益。为此，不同国家的政治地理学者，在理论上和观点上，就很可能存在着明显的差异，这是不足为怪的。与此同时，政治地理学的一般研究内容也可以有其共同的一面，或在不同程度上存在着相互认识上的一致。所有这些，必须就具体问题和不同地区进行分析研究，这也正是地理学的综合观点和区域观点在政治地理研究中体现之所在。

还必须指出，在政治地理研究中必须掌握发展的观点，即从历史演变的视角考察国内和国际政治问题的空间过程，分析各种政治类型及其区域结构，掌握各种重要政治现象的内涵及其变化线索，总结出不同时期的发展特点。

二、世界政治地理形势的历史回顾

追溯世界历史，古代人类曾在很长一个时期衍生聚居于温暖的内陆区域，生息在江河中下游沿岸大片肥沃低平的土地上。这里既有可就近利用的水源，以之灌溉农田，生产衣食等生活物资，还可利用平原和河流或近海的便利条件，由点及面地向邻近地区扩张领地，增大生存发展空间；有的则循着沿海地带向外发

展兼并，扩大领域。前者如亚洲大陆东部古代中国的黄河流域，以及南亚的印度、西南亚的巴比伦，后者则有北非的埃及和东南欧的希腊、罗马等。它们利用河流或沿海的大片肥沃土地，集聚着众多的人口，发展起充实的国力，经济、文化也都相当发达。但在各个政治区域的彼此之间，则由于高山、沙漠、湖泊、沼泽等自然阻障，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的交往联系十分困难。

如就印度而言，其古代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一直是在印度河、恒河两大流域的广阔平原地区，北有东西走向冰雪连年的险峻高山，南部半岛又为波涛汹涌的浩瀚海洋所阻隔，对外的军事、政治和贸易联系，也和古代中国相似，循着西北谷地走廊，通向西亚和中亚邻国。只有介于亚、欧、非三洲之间的东地中海，及其星罗棋布的岛群，在欧洲东南部、亚洲西部和北非沿岸之间，成为天然的内海“桥梁”，使沿岸各国彼此得以沟通联系，古代埃及以及位于东南欧沿海的希腊、罗马等灿烂文化，及其政治、经济、宗教、军事力量，得以向外扩展；同时，也成为多次历史性军事征战的战场。

古代世界由几个主要的核心地区组成的全球政治地理空间结构，在很大程度上说明了大陆时代地理环境的巨大作用。

海洋时代的来临则使世界政治地理格局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15世纪末叶，哥伦布自西欧远航，发现了新大陆，接着，达·伽马、麦哲伦等航海家，又先后绕过南非和南美的南端海角，开始了进入印度洋和太平洋的航行，实现了寻找东方“黄金之地”及环绕地球一周的愿望。人类亦从大陆时代过渡到海洋时代，此时，西欧的西班牙、葡萄牙，以及荷兰、英国、法国等国的冒险家、军官、商人、传教士等，争先恐后地远渡重洋，强占领土，掠夺财富，贩卖奴隶，瓜分世界。经过西方列强从16~18世纪300多年间的争夺，世界政治地图发生了空前的变化，列强在本土之外，建立起各自的势力范围。18世纪末叶，美国独立战争

的胜利和法国大革命的浪潮，激发了拉丁美洲广大地区的人民，经过英勇奋斗，纷纷摆脱西、葡的殖民统治，成立独立的主权国家。19世纪末叶以后，在西太平洋地区日本的崛起，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宣告独立，以及接踵而起的南太平洋上不少新兴岛国的诞生，所有这些都反映了近百年来海洋时代所显示出的世界政治地图的巨大变化，同时也出现了许许多多极度动荡和争夺抗衡的世界政治地理的新问题。对于这一阶段世界政区的主要变化，英国泰晤士的《世界历史地图集》（1982年北京三联译印本）中百幅图页，都循踪追迹地给予了轮廓性的描绘和记述。

在本世纪的几十年里，很多国家从航空技术到高层空间的研究这一浪潮来势极猛，发展迅速，极大地开拓了世界政治地理的视野，相应地又出现了许多崭新的研究课题。单以航空的兴起和发展这一新的领域而言，一方面由于航空速度不断刷新，一般民航飞机的飞行速度每小时可达1000公里以上，使得人们传统的对于空间位置和距离的观念，以及计时单位观念相应地有了革命性的改变。另一方面，高山、大海、海洋、沙漠、森林等等自然物体，基本上已不会成为国内、国际交往通达的障碍，相反地“高空任鸟飞”，更加便利了人们和国际互相联系的捷径。最明显的一个例子：西欧英吉利海峡的一水之隔，使得英国在历史上幸运地避免了多次欧陆战祸的波及。甚至到了19世纪初年，还曾凭借海上舰艇的护卫，而使拿破仑只能“望洋兴叹”，未能实现其率师征服不列颠岛国的夙愿；可是在20世纪的两次大战期间，英国屡遭德国飞机的轰炸，首都伦敦和工业重镇考文垂等大城市，曾遭到德国机群的一再袭击，破坏极为严重。为此，世界许多国家，近年来都竞相建立航空机构，增强高空科学研究，并且为了适应新的形势，积极调整战略措施。例如，对于南极洲和北冰洋两大常年冰雪覆盖的极区，千百年来一直被认为是人迹罕至的禁区，而在今日的航空时代，一变而为飞机航行的坦途，成为当前

世界政治争夺和战略控制的新目标。在美、苏两大强国之间，在以北极为中心的国际新形势地图上，很明显地可以看出，正是以越过北极冰区高空而构成它们相互之间的最短航线，因而在各自建立攻守军事基地的选址上，苏联业已完成其位于国境最西北端濒临北冰洋岸边的科拉半岛上所建立的全国最大的海空基地，而美国也同样不惜巨资在其北邻盟国加拿大北境某地，针锋相对地兴建联合战略防御体系。因为从苏联北部出发的军事飞机或导弹，距离美国东北部的工业和人口、城市密集地区最为便捷，从而位于美国中部的芝加哥，已不再比东西海港纽约和旧金山更为安全。无疑这正是航空时代人们对于空间位置观念的新变化。当今世界高速化航空事业日新月异迅猛发展，更使人们对于遥远的地域距离，日益感受到“天涯若比邻”的现实意义。同时，由于航空技术和飞行速度的不断刷新和改进，也使人们对于习惯性的时间观念，逐渐以往日的年、月、日，转变而对时、分、秒的广泛应用了。这些日益渗透到人们生活及其种种社会活动的新事物、新概念，正是伴随着航空时代所与之俱来的。它们对于人类社会的政治活动，以及其在国内、国际等方面的影响和作用，是极为广泛而深远的。

世界政治地理演变的大致历程，同样也不同程度地反映在中国长期历史发展和演变的过程中。中国是一个世界大国，中国古代的主要政治区域，长期是以黄河中下游和长江南北干、支流两岸广大的、肥沃的冲积平原为核心的。古代的政治枢纽地区与全国四境各个地区相互之间的政治、经济、文化的联系，以及全国各民族人民的互通往来，基本上是靠陆上的道路和河流（包括运河）为其交通的媒介。至于与邻近国家之间的交往、贸易，同样也是以漫长艰险的陆路相互通达的。从早期张骞出使西域，丝绸之路的开通，乃至晋、唐高僧法显和玄奘的远游印度，马可·波罗的东方之行，无论人员的往还，货物的互通，所有对外交通

的门户和路线，长期都是沿袭西北边陲大道；至于东面的沿海地带，则只起着旁门、后门的辅助性作用。明初郑和虽曾完成“远航西洋”的壮举，为时也早于哥伦布等西方航海家的横渡大西洋，但终因明、清两代坚持闭关的国策，限制沿海人民下海放洋，坐失了向海上开发的时机。以致17世纪中叶的鸦片战争之后，西方列强用火炮打开了东部沿海的大门，沿海港口才被迫开放，英、法、美、俄、德、日等国相继入侵，竞相瓜分，取得各自的势力范围。1949年全国解放以后，经过30多年的全国性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我国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力量迅速增强，在国际政治舞台的地位大大提高。近年来，进一步实行对外开放政策，并以沿海为基地逐步向内地发展经济，高速度地建设社会主义，在世界政治地理格局中，展现出一个发展中国家前进的范例，赢得了世界上其它发展中国家的向往和称颂。

三、国家是现代政治地理学研究的主要区域单位

前面所论述的世界政治地理形势的大致演变及其在不同时期的特点，反映着世界政治地理在宏观上的发展历程。但从空间分析的角度而言，人类社会政治活动和政治现象的发生、发展和变化，必然要存在于一定的地域或政区。这些地域或政区，由于幅员的大小，地理位置的座落，自然环境的特点，政治制度的性质，经济发展的水平，乃至人口的数量、民族的构成等等，彼此各不相同，甚至差异极大，从而表现出来的具体的政治地理问题，千差万别。所以，从空间尺度上，可以大致将它们分为全球性或国际的、国家的或国家集团的、以及地方性或城市的几个不同的层次，各个层次出现的政治地理问题，有同有异，而且重点各有不同。其中最大量的和最一般的问题，则在国家这一层次，而且许多这类问题，向上又是带有国际性的，向下也是国内地方性的，大多都有关联，或者还需通过国家这个环节，才能恰当地

予以解决。前者如领土和边界争端、领海和海底资源，以及国际移民等问题，后者如行政区的划分、国土整治规划、经济发展战略、民族区域自治、城乡人口迁移等问题。从表面上看来，有的属于国际性的，有的纯属国内地方性的，但事实上都与国家的军事、外交、内政、经济的方针政策，及其相应的政治决策，有着紧密的联系。因此，在现代政治地理学及其应用与研究中，国家是其基本区域单位。

在当前世界政治地理格局中的独立国家（或称主权国家）和尚未获得独立的地区，总计约有200个左右。它们分布在几个大陆以及散布在许多海洋的岛屿上。除了绝大多数属于岛国或分布在大陆的沿海国家以外，也有少数领土位于大陆内部而没有海岸的内陆国（例如亚洲的蒙古、老挝、尼泊尔、阿富汗；欧洲的瑞士、奥地利、捷克、匈牙利；非洲的赞比亚、乍得；以及南美的巴拉圭、玻利维亚等），它们没有领海和海港；进海山海都要通过其它国家的领土。此外，苏联虽有海域边界，但由于位在高纬地区，缺乏常年的暖水港，实际上具有大陆国家的特点，以致早在沙俄时代，就曾多次企图用军事力量通过西南亚国家南下印度洋。事实上，内陆国家虽不具有自己的海港，但仍可以协商或签定条约向其邻国取得进出海洋的便利。对于岛国或沿海国家而言，则一律拥有领海主权和开发港口，利用领海海域以内一切生物和海底资源的权力，国际法规定，其他国家不得侵犯。

国家领土的面积，相互差异极大，领土最大的国家，依次为苏联、加拿大、中国、美国、巴西等；小的如圣马力诺、瑙鲁，摩纳哥等仅有几个到几十平方公里，目前均属世界国家之林。每个国家领土形成的沿革，各不相同；历史上记述的相邻国家的领土争执，相当频繁，甚至酿成长期战争和夙敌。每经一次世界性或地区性战争之后，往往随之俱来的总是大片领土易手，边界变更。仅本世纪两次世界大战之后，欧陆不少国家之间的政治地

图，变化很大，而大量的民族人口也随之发生迁移潮流。以波兰为例，早在18世纪末叶，经由普鲁士、奥地利、沙俄的三次瓜分，国家为之沦亡，直到本世纪初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波兰重新复国；可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由于国家的东退西扩，领土又作了大的调整。事实上，当前世界各国之间的大的边界纠纷，据美国全国地理学会专家的粗略估计，至少有150起以上。该学会为此还设立了一个专门性的边界委员会，来处理出版地图时所面临的政治问题。新中国成立后，我国政府本着互谅互让精神，通过友好协商，使大部分边界悬案先后顺利解决，但仍存在着中印、中苏之间的边界问题，有待于尽早加以协商解决。

政治地理学所须研究的领土与边界问题，还不仅限于领陆一个方面，因为构成一个主权国家的领土这一要素，还必须包括领海、领空两个内容，而在研究这些具体问题时，对于涉及到领海、领空的理论问题，界限规定及其检查、保卫等一系列问题尚缺乏实践和经验总结，均需尽早着手专门研究。

当前世界的国家中，由于领土的大小悬殊，政治经济的实力更是强弱不一。许多地区相邻或制度类似的国家，竞相联合组成国家集团，通过政治上的联合，以求达到经济上的互惠互利，并且力图在军事上攻守一致。这一趋势现仍在有增无减，这是世界政治地理格局不断演变发展的新动向，它的作用和影响随着整个国际政治经济形势的紧张与缓和，而呈现明显的同步变化。因此，许多世界政治地理现象的产生和演变，往往不是由一个国家，而是由国家集团的联合作用形成的。

在一个国家以内，通常通过首都这个政治中心，推动其对内对外的方针政策，因此在政治地理学的研究中，对于首都在其国家政治结构中的重要作用，给予很大的重视。早在古代历史上，一国的首都位置，通常构成当时政治、经济、文化的核心区。但随着形势的发展，又可适应新的形势需要，而把首都另迁他地。

如我国古代各个王朝，设都西安、洛阳、开封等地，以后逐渐迁向东部近海地区的南京、杭州和北京，大体上反映其全国政治、经济中心渐向东部沿海地区转移的总趋势。当然，其他国家迁都之举，也屡有发生，有的适应本国不同时期的国策，由沿海迁向内陆，苏联、土耳其、印度、巴基斯坦、巴西等国，就属于这一类型。

其他行政区（包括民族自治区、特别行政区等等）的设置及其划界，以及多级行政区的选定和迁移，是属于国内政区格局的问题。西方各国的州、郡、省、区等各自不同的规定，都是根据实际需要，参考历史和自然条件特点，经过调查研究及相应级别的审议决定，才设置或变易的。我国千百年来各级地方志，记载翔实，资料丰富，是研究我国行政区问题的重要参考文献。

在我国人文地理学研究中，政治地理学一直是一个比较薄弱的分支。几年前，在中国地理学会所组织的人文地理学讨论会上，我曾根据过去所做工作的体会和学习心得，作了有关政治地理学的发展和研究内容的发言，并吁请有关学者加强研究，促使政治地理学这一学科尽快迈进。现在，在我为王正毅同志的《现代政治地理学》一书作序言时，我愿再次强调，希望有关学者加强合作，共同研究一些问题，为目前我国国内和国际政治地理学的研究作出应有的贡献。

目前，研究政治地理学的文章在我国一些报刊杂志上多起来了。但是，就系统地研究政治地理学的专著来说，王正毅同志的《现代政治地理学》在我国大陆还是第一本，这是一个有益的尝试。书中的不少看法是很有启发性的，如把政治区域作为政治地理学的一个基本范畴，以此来建构理论框架，有作者自己独特的思路，克服了西方某些学者囿于案例分析的片面性；从政治价值这一角度来评价海洋、边界、南极洲、太空这些地理区域的意义，具有很强的现实性；对当代国际冲突和国际合作所作的地理

透视，为了解和掌握当代国际政治和国际关系提供了一个新的角度。这些研究工作都是很有意义的。

鲍觉民

1991年7月于

南开大学

前 言

政治地理学是人文地理学的一个重要分支，同时又是一门介于政治学和地理学之间的边缘学科。它主要研究人类社会的政治活动及其过程与地理空间之间的相互关系。

(一)

如果追根寻源，政治地理学的思想萌芽古已有之，古希腊著名的思想家柏拉图在《理想国》、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等著作中都曾就政治活动和地理环境的相互关系作过论述。但一直到19世纪，这些研究或停留在抽象的思辨中，或停留于某些经验材料的描述中。政治地理学作为一门学科被系统化、理论化始于19世纪下半叶，其标志是1897年德国著名地理学家拉采尔（Friedrich Ratzel, 1844—1904）出版的《政治地理学》一书。其后，经过英国的地理学家麦金德（Sir Halford Mackinder, 1861—1947）、美国著名的历史学家马汉（M.T. Mahan, 1840—1914）等人的努力，政治地理学作为一门学科，无论在内容上，还是体系上都得到了不同程度的发展。

然而，第一、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首先是在德国，以霍斯豪夫（K. Haushofer）为首掀起了一股为德国侵略扩张寻找理论依据的“地缘政治”思潮，鼓吹“地理环境决定论”，这股逆流使得人们一谈到政治和地理空间的关系就心有余悸，甚至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政治学家和地理学家们都不愿把政治地理学作为一门真正的科学来研究，这使得一度受人重视的政治地理学这门学

科的发展受到阻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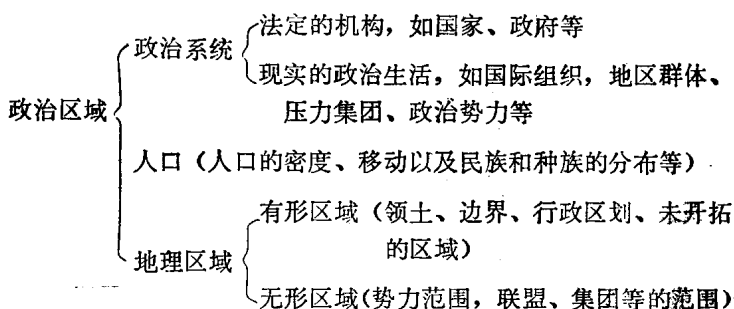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特别是本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政治地理学开始摆脱了“地缘政治”所笼罩着的阴影,首先在西方得到发展。许多政治学家和地理学家为此作出了巨大贡献,使得政治地理学作为一门学科向前迈进了一大步,出现了一些有影响的关于政治地理学的著作和文章,如穆迪的《政治背后的地理》(Geography behind Politics, A. E. Moodie, Hutchinson University Library, 1961), 哈特向的《当代世界政治地理》(Political Geography in the Modern World, R. Hartshorne,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 1960), 伊斯特和穆迪合著的《变化中的世界: 政治地理研究》(The changing World: Studies in Political Geography, W. G. East and A. E. Moodie, Harrap, 1956), 科恩的《地理和分化世界中的政治》(Geography and Politics in a Divided World, S. B. Cohen, Methuen, London, 1964), 普雷斯科特的《边疆和边界地理》(The Geography of Frontiers and Boundaries, J. R. V. Prescott, Hutchinson University Press, 1965), 魏格特的《政治地理学原理》(Principles of Political Geography, H. W. Weigert, New York, 1970), 普雷斯科特的《政治地理学》(Political Geography, J. R. V. Prescott, Methuen, 1972), 戈特曼的《领土的重要性》(The Significance of Territory, Jean Gottmann, Virginia University Press, 1973), 穆尔的《当代政治地理学》(Modern Political Geography, R. Muir, Macmillan, 1979), 格兰斯纳和德布烈杰合著的《系统政治地理学》(Systematic political Geography, M. I. Glassner and H. J. de Blij, New York, 1980) 等等。这些著作以及其它一些文章对政治地理学的许多问题都作了具体的分析和研究, 为政治地理学的

发展和提高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但纵观政治地理学在西方的发展，也存在着两方面的不足：一是在政治地理学这一学科体系建立上，某些著作过分注重案例分析和具体资料的研究，理论上的进展并不太大，讨论政治地理学这门学科体系的专著不多。如被视为政治地理学的经典著作、美国著名政治地理学家鲍曼(Isaiah Bowman)所著的《新世界：政治地理中的问题》(The New World: Problems in Political Geography, Bowman Isaiah, New York, 1928)侧重于对各主要国家具体的政治地理问题进行研究。另一部较有影响、被国外许多大学当作教科书的著作《世界政治地理》(World Political Geography, Pearecy G.E., New York: Harcourt, 1957)也是以各洲(第二编)和专题(第三编)研究为主，理论性不强。近年来虽然也出现了一些理论性较强的著作，如穆尔的《当代政治地理学》、德布烈杰的《系统政治地理学》等，但仍不能满足政治地理学这一学科建设的需要，这就需要在理论上进一步充实和完善；二是在研究方法上，随着政治地理学这门学科的成熟，出现了多种不同的研究方法，如历史方法、形态方法、功能方法、系统方法。但这些方法在使用过程中常常是描述多于分析，而且由于作者立场的局限性，在使用这些方法建构理论和分析问题时，经常过分夸大地理环境的作用。这就需要在研究方法上进一步更新。鉴于政治地理学在西方的发展状况，我们认为，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建立系统化、理论化、科学化的政治地理学已成为我们的当务之急。

(二)

任何一门科学都有其特定的研究对象，有其最基本的范畴以及相应的由这些范畴构成的学科体系。政治地理学一方面从空间角度来研究人类社会政治现象和政治过程产生和发展的原因和结果，研究人类社会政治现象和政治过程在地理空间中分布的一般

规律和特征；另一方面研究人类社会政治现象和政治过程对地理空间的改变。这种研究必然集中在对政治区域的研究上。因为，人类政治活动的结果必然是形成各种各样的政治区域，而政治区域又反过来为人类政治活动提供了场所。政治区域是联结人类政治活动和地理区域一条链上的“纽结”。政治区域作为政治地理学的一个最基本的范畴，有三个最基本的组成要素：第一，政治系统（既包括法定的机构，如“国家”、“政府”，也包括国际组织、地区群体这些现实的政治组织）；第二，人口（既包括人口的数量、密度，又包括人口的移动、种族的分布）；第三，地理区域（领土、疆界、资源以及势力范围、联盟等所指的区域）。用图表可以表示如下：



任何政治区域都是由这三个要素组成的有机统一体。这三个要素相互统一、相互作用，由此构成了政治地理学这门学科的体系和具体内容。

本书的体系及各章内容如下：

第一章：总论。主要讨论政治地理学这门科学的研究对象、发展过程以及研究方法，着重分析了历史上曾作为侵略扩张的理论依据的“地缘政治”（Geopolitics）和作为一门科学的“政治地理学”（Political Geography）的区别。

第二章：政治区域。从一般理论角度对政治区域这个范畴的